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北上的 “本事”与“叙述” ——以主流报纸舆论为中心

杨 瑞

摘 要：1924年孙中山北上，攸关全国政治格局重组及其个人政治形象的再建构。回到历史现场，发现孙中山北上的事实本身及其本意，与南北不同政派和报纸舆论的观察、解读虽有部分吻合，但更多地呈现出来的是背离与错位。本应清晰确定的“本事”，经由不同政派和报纸舆论演绎重塑后，变为众说纷纭、游移不定甚而真假莫辨的罗生门式“叙述”。通过爬梳相关史料，并以此历史事件为中枢尽可能地排比各相关方史事，正向寻绎“本事”转换为“叙述”的逻辑，反向回溯“叙述”还原“本事”，探源两者间的内在关联，不失为解读孙中山北上本意以及南北内外政治互动与演化的有效锁钥，从而得以揭示不同政派围绕新政治体系重建各种错综复杂的事实联系和内外影响。

关键词：孙中山北上 “本事”与“叙述” 报纸舆论 南北问题

1924年的北京政变以及随后之孙中山北上，激起中国政治与舆论的千层浪，南北各政派空前密集互动，一时函电往来交乘，与政治的区隔化、细分化对应形成多个影响较大的舆论中心。海内外学界对孙中山此次北上的原因、经过以及与各种政治力量关系的研究成果斐然，^①但对于这一事件所引发的连锁新闻舆论效应及其背后政治运作，着眼整体历史通贯地辨正“本事”与“叙述”之间的关系，仍有较大的扩充余地。历史事件本身作为事实是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且为确定的历史过程，而历史事件发生的过程同时是历史叙述和历史知识生产的过程，甚至二者呈现一种此消彼长的状态。进言之，“叙述”向世人传递了看上去确定的历史知识而变得愈加清晰，“本事”则由于受众多历史叙述的干扰和影响渐显模糊，甚至捉摸不定，史家要想回到“本事”，则需要拨开纷繁歧乱“叙述”的重重迷雾。新闻舆论作为一种外部观察和评判，除去客观

^① 海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刘曼容《1924年孙中山北上与日本的关系》（《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1924年孙中山北上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1924年孙中山北上的原因探析》（《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孙中山北上与其实行“中央革命”的设想》（《广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廖永武《欢迎孙中山北上与国民会议运动》（《天津师大学报》1985年第1期），吴元康《段祺瑞对待孙中山先生北上的态度》（《安徽史学》1996年第4期），桑兵《解读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真意》（《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1期），李杨《鲍罗廷与孙中山北上》（《广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等。

条件差异性之外，其政治立场和倾向性等主观性因素，深度影响着对历史事件的描述和表述，甚至形成具有某种不确定性的多元化历史叙述，于是“叙述”与“本事”之间产生了一定的距离和张力，但它本身即为构成整体历史的一部分，也是复原“本事”难以绕开的必要因素。孙中山北上是一个连续的事实发生和演进的过程，在南北主流报纸中产生一连串的新闻舆论效应，后者既是对前者的适时观察、描述和反应，同时也是对前者不断地进行建构和重构的过程，在试图澄清事实或形塑社会舆论的同时，往往不可避免地夹杂着价值判断，这都给后来人重新认识它带来无限的复杂性。

基于此，本文通过纷繁史实努力回到历史现场，围绕孙中山北上这一中枢历史事件，贯通并比勘前后左右内外相关史事，以期在整体历史中爬梳其故实，依时展现不同政派与新闻舆论互动与角力的历史演化，以及南北政争大幕下政治与社会的各种复杂面相，深层揭示孙中山北上本意。

一、南与北：迎孙、阻孙与拒孙

1924年10月22日，时为直系阵营的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孙岳发动反直武装政变，史称“北京政变”。对于这场被称为“中国正遭遇即将迈上统一路途之重大时机”、^①“中国统一之大枢纽”^②的政治大变动，南北各方的认知与评断却相差各异，这些均不同程度地成为影响孙中山晚年北上这一历史事件的关联性因素，不可不细察深究。

事变后的冯氏对自身行为评估与外部评论判若两途，而且前后也大不相同。10月23日，冯在日记中记述其对外谈话称：“此次班师回京，完全为国民请命，绝无私意”。^③冯氏此番及其以后一系列谈话，实际上均含有较为明显的自我辩白和粉饰成分。同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联名发表全国和平通电，宣称：“至一切政治善后问题，应请全国贤达急起直追，会商补救之方，共开更新之局。所谓多难兴邦，或即在是。”^④同时，还抛出了以“委员制”改造国家政体的新方案，段祺瑞、孙中山、唐继尧、卢永祥等9人均在此列。诸如此类公开宣讲陈义甚高，冠冕堂皇，其私密记载亦无明显破绽，然而综观全国不同舆论中心风向，京师内外有别，褒贬格外分明。

京师的主流新闻舆论几乎是跟着冯玉祥的定调同声相应。《京报》记者邵飘萍几乎全文转录了23日下午冯的谈话：“对曹总统并无恶感，对吴子玉（佩孚）亦保全私交，唯万不得已，为民请命，为国救亡，绝对无其他目的。”^⑤其他报纸则迫于生存考虑，在发表时事评论时，也都颇为曲隐。作为研究系报纸的《晨报》，在政变两天后发表社论表明：“本报在此武力高压之下，固亦不能畅所欲言，然记载战事之消息，要必加入种种暗示，冀读者于字里行间，想见其万一。”^⑥无独有偶，日系报纸《顺天时报》于政变前一日，其发行工作突遭警方查扣，被迫紧急重申所谓“言论自由主义”与“公平中立”新闻立场，在随后发表的社论中一方面批评此次战

① 《致泽村幸夫电》（1924年11月12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10页。

② 惠风：《我对于北京政变的观察》，《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10月25日，第1张第2版。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1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36页。

④ 《冯玉祥等主张和平之通电》，《晨报》1924年10月24日，第2版。

⑤ 《冯检阅使与本社邵君谈话》，《京报》1924年10月24日，第2版。

⑥ 《时局与本报之地位》，《晨报》1924年10月24日，第2版。

争乃“朋党之私斗”；另一方面颂美“冯将军毅然而起”的停战义举以及冯军“军规严厉”。^①可见，京师的立场，与取向各异的报纸对于同一“本事”的叙述方式和风格惊人一致，几乎同趋于在溢美声中婉转地表达弦外之音。

相反，北京以外报纸舆论的叙述，转呈另外一种趋同现象，即毁多誉少，贬斥胜于颂扬。天津罗马天主教会报纸《天津益世报》基于教派敌对缘故，斥责冯玉祥是“张勋第二”。^②同为日系的《盛京时报》谓其“朝秦暮楚，首鼠两端之将何以自解”，且“以基督信徒，突有此不信之行，彼潘周夏超，又奚责焉”。^③长江流域齐燮元、孙传芳等直系将领大骂冯玉祥为“逆贼”，“反骨外张，祸心内藏，豕突京邑，鼠跳中央，胁夺兵权，矫发伪令”。^④很快，上海成为全国“讨冯”的最强舆论中心。《民国日报》附刊《评论之评论》和《觉悟》等，是当时最早发表中共“讨冯”言论的报纸之一，批评“中国唯一的救国者”其实质“亦是一位军阀”；^⑤“倒了吴佩孚，撵了曹锟，继起还是一个军阀”；^⑥甚而认为“基督将军为北京政府之独裁者”，意味着“基督教人格救国”破产。^⑦与之相呼应，中共机关报《向导》也发表了系列时评，称“此次北京政变，显然是英美帝国主义者抛弃了一个旧工具——吴佩孚，另换上一个新工具——冯玉祥，这个新工具比旧工具更柔顺从服一点，更得中国的所谓‘舆论’赞助一点”；^⑧“英美帝国主义的宠儿冯玉祥，在吴佩孚不利的形势下，跑回北京，主持停战，代替帝国主义者执行前此预定之计划”。^⑨就连同属研究系的《时事新报》，却与《晨报》取向大相径庭：“以冯此次人格上之损失，实百倍于驱黎时之逼宫。”^⑩报纸《字林西报》亦言，冯“败坏道德，必难号召”。^⑪综合而观，京师舆论走向确实受到冯氏集团的干预或暗示，而中共所言冯玉祥甘为英、美帝国主义的“马前卒”，则成为国民党左派反对孙中山北上的重要理据之一。

陈炯明、孙中山对“北京政变”的不同态度，在岭南政治分裂下报纸舆论中得以充分体现。与陈炯明关系密切的《香港华字日报》的立场和观点，主要围绕私德与权斗展开解读，认为此次政变纯属“冯吴之私斗”，冯玉祥的动机只在报复吴佩孚，并谓其“历史上安有反覆无常而可与谈天下事者，竖子不足与谋”。^⑫

孙中山及国民党内部的研判，则根据冯玉祥自身言行和态度的变化而动态调整。冯玉祥刚开始时将此次政变定位为“只为改良政治，而非革命”，国民党机关报《广州民国日报》则认为其“换汤不换药之革命”，无异于暗指冯玉祥亦是“军阀”之为。^⑬但在10月27日，孙中山在全国“讨冯”声中首次公开“挺冯”并表态北上，谓：“冯焕章、王孝伯、胡笠僧、孙禹行诸先生鉴，义旗聿举，大愆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慰，建设之计，急须决定，拟即日北上，

① 《冯使之强制停战》，《顺天时报》1924年10月24日，第2版。

② 《某政治家之谭话》，《天津益世报》1924年11月1日，第1张第3版。

③ 顽：《力与理》，《盛京时报》1924年10月26日，第1版。

④ 《直系八将领联名通电讨冯》，《大公报》（长沙）1924年10月30日，第1张第2版。

⑤ 大雷：《北京之政变》，《民国日报附刊·评论之评论》第32期，1924年10月26日，第1页。

⑥ 玄庐：《军阀倒和倒军阀》（上），《民国日报》1924年10月30日，第1张第3版。

⑦ 《社评》，《民国日报附刊·觉悟》第11期，1924年10月28日，第2页。

⑧ 独秀：《北京政变与中国人民》，《向导》第89期，1924年10月29日，第733页。

⑨ 和森：《北京政变之内幕及其结果》，《向导》第89期，1924年10月29日，第734页。

⑩ 《政变罪言》，《时事新报》1924年10月26日，第1张第2版。

⑪ 参见《西报讥冯玉祥诡谋》，《时事新报》1924年10月28日，第1张第4版。

⑫ 惠风：《国民党速起自救》，《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11月5日，第1张第2版。

⑬ 孚木：《曹吴倒后革命政府之责任》，《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0月27日，第6版。

与诸兄晤商。”^①同日，他还致电段祺瑞表示“拟即日北上晤商一切”。^②孙中山此举实际上是着眼全局试图通过远交近攻来整合全国政治的筹划：近则争取滇、湘、桂系对付陈炯明，稳固广东革命大本营，合组“建国联军”从事北伐；远则借助“合纵”术着意向广东以外发展，外结皖奉浙派系并攀划西北军事合作。因此，争取冯玉祥为其中重要一环。10月28日，张作霖亦表态即刻入关会商善后，并传其“拥段助冯”拟向山海关下总攻令。31日，久居天津的段祺瑞态度谦恭地表示：“时机初转，百废待兴，洵如来教，应加攀划。公元功照耀，政想宏深，命驾北来，登高发响，此天下之所想望，尤南北合力统一之先声。”^③稍后，段、张、冯联名表示愿奉孙中山为“大元帅”并主持国政，段为“副元帅兼总司令”。另据《大阪每日新闻》载：孙中山对联奉结果不无乐观地表示“余与张段间之意见，现已大致相同，余当与段张提携，解决国是”。^④故孙中山表示俟北伐军入赣后约十日左右赴京：“文已移驻韶关，宣告邦人，出师入赣，期与浙、奉义军一致讨贼。”^⑤

基于孙、冯关系迅速拉近，冯玉祥的态度也随之发生改变，他在南方多头政治格局中，最终选定联合孙中山；与北方反直阵营各方，更倾向于段祺瑞，对武力强大的张作霖则心存芥蒂：“凭我与胡、孙声望太小……段芝泉到京后，我即飘然远引。……我确信中山出，不能如陈迥[炯]明之仇斗”。^⑥冯氏有意将结盟对象收缩于孙、段和张三方，显然有意借重三角同盟扩充一己影响，争做重新洗牌中国政局的要角。但具体原委却殊异，联合孙中山之深意在于重塑其“革命者”的政治形象，并借力平衡北方各实力派，以改善其弱势地位。10月29日，他在答《英文导报》主笔柯乐文时，将此前“改良政治”定调改为“革命行动”说，“吾今所革者，乃军权万能之命，非革政治之命”。^⑦冯玉祥以此论证其政变行为的合法性，亦因此被指明结孙中山，暗交共产党，是“赤化”前奏。但其促孙北上的初衷未变，10月23日至11月13日（孙中山北上之日），冯玉祥单独或以联衔形式发电函9次，胡景翼、孙岳各1次；单独发函8次（包括1次复函）。可见，冯氏系“迎孙”舆论的始作俑者，在其大力营造和运动下，南北形成一股促孙北上的社会舆论。

11月初，冯玉祥亲自致函孙中山：“先生（乃）党国伟人，革命先进，务祈即日北上，指导一切”，并派马伯援往广州迎接。^⑧他又自谦说自己乃武人“不谙政治”，而孙中山作为“国家元勋，爱国情切，宏谟硕画，佩仰夙深，万乞发抒说论，俾国内人士知所遵从”。^⑨11月3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16人，联衔邀孙北上，辞情恳切而恭敬地表示“此后一切建国方略，仍

① 《孙文行将北来》，《天津益世报》1924年11月4日，第1张第3版。

② 《致段祺瑞》（1924年10月27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251页。

③ 《大元帅与段芝泉往还电》，《民国日报》1924年11月8日，第1张第2版。

④ 参见《孙文与日记者之谈话》，《晨报》1924年11月8日，第3版。

⑤ 《复段祺瑞电》（1924年9月19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82页。

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1册，第648—649页。

⑦ 《冯玉祥之革命新解》，《时事新报》1924年11月8日，第1张第3版。

⑧ 《冯玉祥致孙中山函》（1924年11月初），桑兵主编：《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第9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64页。

⑨ 《冯玉祥、王承斌等致孙中山电》（1924年11月1日），桑兵主编：《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第9卷，第164页。

赖先生指示”。^①汪精卫阅后表示：“这几句简单明瞭（了）的说话，革命党人的真面目，完全显出，可见这一次驱逐曹吴，完全是为扫除革命进行的障碍物。”^②冯玉祥的表态，对孙中山的决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日《广州民国日报》首次正式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名义对外宣布“大元帅已决定在此星期内北上”。11月4日，孙中山亦称“数日之后即轻装北上”，^③并阐明“根本之图，尤在速谋统一，以从事建设”。^④冯玉祥真正打动孙中山的是，5日他将清室宣统帝逐出皇宫、取消帝号的行动。^⑤是日，孙中山电复加拉罕：“拟将粤事清理后，两三日即可北上。”^⑥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宣布其北上要旨：一是“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二是“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于建设”。他将本来作为泛称使用的“军阀”概念，确指为袁世凯、曹錕、吴佩孚等“北洋派”人物，且皆为“帝国主义之傀儡”。^⑦孙中山有意将其他军阀忽略不计，意在最大程度地扩充盟友圈，共同解决直系及其背后的英帝国主义这一主要矛盾，在策略上表现出打通南北政治的灵活和务实。因此，他将冯玉祥抬升为革命同道，将“政变”定性为“革命”，且为实行“中央革命的头一步”，由此，孙、冯之间在价值和事实上形成政治契合。

“迎孙”舆论兴起之时，源于不同政派分歧的各种“倒孙”、“阻孙”与“拒孙”舆论竞相传开、相互交织。《香港华字日报》是“倒孙”、“阻孙”南方舆论中心的重要营造者。其宣传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其一，针对“商团事件”，责斥孙中山为乱杀无辜的“屠城”行径，要把广州市做“共产主义的试验场”，“孙文底残暴淫威，有过于专制国底皇帝。这种□不是革命党人应取的手段。我敢说世界底革命党人，都会嗤之以鼻，别要把革命党三字玷污了”。^⑧其二，孙中山北上奉加拉罕之命，充当向北方宣传“赤化”的急先锋，苏俄为其补贴宣传费和印刷宣传品。其三，斥责孙中山为野心家，“素好称孤道寡，以民国皇帝自居”，试图以“建国政府元首”掌控北京政府。基于此，断言孙与冯、段皆无合作可能。^⑨

北方“倒孙”舆论中心主要集中于京津地区，尤以《天津益世报》为代表，其矛头直指孙

① 《孙文允清理粤事后北来》，《顺天时报》1924年11月5日，第3版。

② 精卫：《一封努力革命的电报》，《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1月8日，第6版。

③ 《复冯玉祥等电》（1924年11月4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277页。

④ 《肃清余孽绥靖地方通令》（1924年11月4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278页。

⑤ 清帝出宫当天，对政变“还不曾说过话”的胡适致书王正廷、冯玉祥陈述反对意见：“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致王正廷》（稿），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45页）顾颉刚记道：“此事手段太辣，予心甚不忍。开会之际，众人称快，予独凄然。”（《顾颉刚日记》卷1，1924年11月6日，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50页）日系报纸转述英文京津泰晤士报社论，评论此等行是“民国共和史上，可谓为最可齷蹉之事件”，可见冯氏“背信弃义乃常习行为”。（《清室与冯玉祥》，《顺天时报》1924年11月12日，第3版）

⑥ 《孙文决定北上》，《晨报》1924年11月5日，第2版。

⑦ 《北上宣言》（1924年11月10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294—295页。

⑧ 何民魂：《自杀底孙文》，《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10月24日，第1张第2版。

⑨ 《孙文北上与广州政局之变化》，《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11月4日，第1张第3版；《孙文北上之将来》，《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11月5日，第1张第3版。

中山炮击广州城一事。认其以“欲假三民主义之名，而造成共产主义之实”；^①“纵兵焚掠广州，劫杀市民，为千古以来凶至暴极者所不敢为”，无异于清朝“嘉定屠城”“扬州十日”的民族屠杀。^②其后，又接连揭露其祸粤罪恶“真相”：10月15日，“庄严灿烂之广州城厢，竟被孙文所部之匪军，开炮轰击，纵火焚烧，刹那之间，数十万市民，不死于弹，即葬于火，数千万财产，非被抢于兵，即被劫于匪，此广州市空前未有之浩劫。”^③《晨报》随即刊发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痛诋”孙中山的不平之鸣。以上两报口头标榜客观报道，实则充满了敌意、臆测和歪曲，其真实用心在于转移世人视线、阻止孙中山北上。《顺天时报》殊途而同归，以新闻语言竭力渲染、挑动国民党内斗，分化中俄结盟，并根据政见异同将国民党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派：一派系“反共产”派，以张继、冯自由、居正、谢持等为中心，居党员多数，极端赞成北上，主张维持三角同盟以与直系相抗；另一派系“共产”派，以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为首，居党员少数，极端反对北上，排斥三角同盟，主张联合工农学各界发动国民大革命，解密鲍罗廷为此派背后总指挥。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谭平山、戴季陶、邹鲁等人视“北上”为“投降军阀”而大加反对。孙中山对此洞若观火：“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而汉民已失此信仰，当然不应加入，于事乃为有济；若必加入，反多妨碍，而两失其用，此固不容客气也。精卫本亦非俄派之革命，不加入亦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而汉民、精卫恐皆不能降心相从。”^④孙中山重申了北上非但“并非有妥协之意味”，甚而对扩张党务意义重大。^⑤

与此同时，这些媒介也在精心构筑“拥段”的新闻舆论，以抵消“迎孙”舆论的社会效应，甚至造成寄希望于段祺瑞出山收拾局面的全国性声势，反映了他们以段代孙的政治心理倾向。冯玉祥视段祺瑞为“背后有力人物”而主动示好，入京后即遣张伯烈赴津迎接；王承斌派李竟荣赴津；张作霖亦遣鲍贵卿至津促段。^⑥冯、段暗通款曲，均不排除打通京津政治、问鼎中央权力的想法。10月31日，张作霖、卢永祥等通电推段祺瑞为联军统帅。^⑦11月4日，山西督军阎锡山、察哈尔都统张锡元、绥远都统马福祥联衔发表“拥段”通电。同日，全国青年同志社发表通电请段入京，以大元帅身份主持国政。至11月7日，除闽、苏、浙三省外，东三省、川、云、贵、湘、粤、皖、晋、直、沪均表态“拥段”。段派中坚姚震、陆宗舆、丁士源等多方奔走活动，表明“拥段”的新闻舆论是由段派人物与拥段媒介默契并合力造成。段祺瑞本人故作扭捏之态，以“不能急遽入京，实属别有苦衷”加以婉拒。《华北明星报》解读其为伺机而动：“盖段必俟国民表示愿望与要求之后，始可允许出任领袖。”^⑧段祺瑞所谓

① 典：《年来粤中》（二），《天津益世报》1924年10月25日，第2张第6版。

② 典：《呜呼，孙文之今昔》，《天津益世报》1924年10月27日，第2张第6版。

③ 椎心：《孙文屠杀广州市民详记》，《天津益世报》1924年11月2日，第2张第7版。

④ 《致蒋中正函》（1924年10月9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145页。但另有认为，胡汉民乃“别有用心”，“一面装出孙中山的股肱心腹的样子，参加国共两党联合战线的工作，暗通右派搞反共反俄的活动”。参见《包惠僧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6页。

⑤ 《批巴达维亚同志电》（1924年11月1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263页。

⑥ 另有云：奉天决定若段出山，东三省即取消独立，服从中央；否则仍固持保境安民主义，中央与东三省严为区分，不为混同。参见《段祺瑞明日入京》，《晨报》1924年11月4日，第2版。

⑦ 《张卢等一致拥段》，《民国日报》1924年11月1日，第2张第5版。

⑧ 《段祺瑞来京尚有待》，《晨报》1924年11月7日，第3版。

“苦衷”不过托辞，从其屡屡盛赞孙、冯为“今日中国之砥柱”^①言辞，不难推测其最为顾忌者恐为孙、冯联手。至此，全国形成“迎孙”与“拥段”两大新闻舆论格调，它不仅系由政治人物与新闻媒介合力营造出来的，亦为南北交相互动、相激相荡，政治与舆论相互塑造所产生的政治、文化现象。

二、内与外：自上海绕道日本

11月8日，粤电讯称：孙中山13日由粤起程，14日自港乘“春洋丸”号赴沪。10日，孙中山致电冯玉祥亲自予以证实。^②交通工具方面，他先乘“永丰”舰至香港，再转乘“春洋丸”号赴沪，澄清了外界盛传的乘坐俄国瓦洛斯基兵舰不实传闻。但关于孙中山北上其他方面的传闻大量爆出，纷繁歧乱，且互有抵牾。

11月17日，孙中山抵达上海。在面对现场沸腾的欢迎人群时，他表现得“极为乐观”，甚至畅想“余前者唱道[倡导]之和平统一，今殆可以实现矣！”^③这与政变后一般社会民众畅想和平指日可待的心境颇为相通。但关于孙中山此次北上的动机，南北舆论众说纷纭。《晨报》将其北上动机主要解读为权力之争：一是希望各方拥其为首领，推行委员制；二是乘机攫取一部分势力，再利用冯玉祥等实力派与段祺瑞、张作霖对峙。^④《天津日报》亦认为他是为分享反直派的战功而来的，但南北如冰炭绝难相容，“历来北方人物最惧南方空气，无论奉派孙段两氏及冯玉祥派，与共同反对之吴佩孚，似颇一致。时至今日，则素为私利结合之团体，势必各自为谋、互相争权。况南北思想，绝难相容，勉强联络，不过一时之暂合耳”。^⑤《盛京时报》也持类似的观点，表示粤人欲以孙中山行总统职权；^⑥转而又言，孙中山论实力不及张作霖、冯玉祥，声望不如段祺瑞，“如复抱政治野心，及理想偏见，与各大势力家相争衡，而失败之机，即肇目前”。^⑦《天津益世报》、《大公报》都发表了相关的评论，但二者观点迥异。前者对孙中山北上不时地泼冷水，始则称其“北来之勇气，已锐减于前”，继而言其为人“向不肯居人下，而时时以中山先生自命者也，其多年相从之部属，有时且不能忍受，若气贯长虹之时髦，安能静坐以听其讲演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大议论。中山之为人所不肯容，中山亦自知之”。^⑧认为孙中山无论是在党内地位还是自身实力，能否北来还是悬念。后者则认为，此次政变成功为三角同盟的胜利，故孙中山北上与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共谋大局是情理中事，并研判其不会因左派阻挠而中止行程。^⑨

就南方报纸而言，《申报》以独立报人立场发表了评论，认为孙中山作为国民党领袖，其“意见不足以代表南方”。^⑩《字林西报》分析认为，位处长江流域的各督是决定南北关系的重要砝码，“倘段与长江各督结合，则天津方面将无中山之位置，因中山仍为长江各督所反对也，是

① 《段祺瑞盛赞孙文冯玉祥》，《京报》1924年11月7日，第3版。

② 《孙文定十三日北上》，《晨报》1924年11月11日，第2版。

③ 《孙中山抵沪记》，《申报》1924年11月18日，第3张第9版。

④ 《孙文对于时局之真意》，《晨报》1924年11月12日，第2版。

⑤ 《东报对中国时局之悲观》，《申报》1924年11月10日，第2张第6版。

⑥ 《粤人请孙中山行总统职权》，《盛京时报》1924年11月11日，第1版。

⑦ 乡福：《孙中山北上》，《盛京时报》1924年11月12日，第1版。

⑧ 泽民：《北京人眼中的天津会议》，《天津益世报》1924年11月18日，第1张第3版。

⑨ 《孙中山北上问题》，《大公报》1924年11月15日，第1张第4版。

⑩ 《中国收拾时局之难点》，《申报》1924年11月13日，第2张第5版。

故孙氏苟于此际北上，将有被人冷淡之危险”。^①事实上，齐燮元、萧耀南、孙传芳、刘镇华、杜锡珪、周荫人、蔡成勋、马联甲、李济臣、李炳之等长江各督军，于孙中山动身前即联合发表“拥段”通电，但以“保障各旧人地位”为前提。^②此中多少寓意孙中山北上不合时宜，抑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孙中山抵沪后，虽表示“一两日即来津”，但并未见行动，也引起了南北各种臆测。《字林西报》称孙中山在北方时局未定以前不会北上。《晨报》早先也持同样的观点，称京津国民党员焦易堂等劝孙中山“暂缓北来”；^③但在20日很快转引了东方社的消息，率先爆料孙在北上之前拟赴日本与该朝野交换意见。^④关于孙中山在北上之前为什么绕道日本，是时舆论主要持两种看法：一种是上海至天津舱位已满说，以《申报》等南方舆论为代表。称孙中山一行是“临时决定”，在日至多停留3天。^⑤中美社转引东交民巷消息，对此报道也表示认同。另一种是“避险”说，主要集中在北方的新闻媒体。《晨报》转引电通社消息：孙中山为避不测危险，改乘日轮到门司，再由此轮换赴津。^⑥《顺天时报》也报道，孙为“旅途中之安全计”，而转道关东赴津。^⑦《天津益世报》、《香港华字日报》则从另外的角度对此次事件进行了解读，认为孙中山此次绕道日本“带有关系重大之意义”；^⑧与“京事欲得日人助力”、借款问题以及观望形势有关；^⑨意在借日本以自重。^⑩

事实上，孙中山在绕道日本北上的问题上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表面上对外界各种传闻予以否认，暗中却在布置相关事宜。但对孙中山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南北关系突生重大变故。在局势前景一片黯淡的情况下，他被迫进行了“策略性”调整，由“通南北”快速调整为“通内外”，以期通过“通内外”促使“南北通”。

11月15日，正是在孙中山北上的途中，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在未事先知会南方的情况下，突然以“非暂定一总揽权责之名称，不足以支变局”为由，公推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⑪舆论瞬间哗然，《顺天时报》亦认为其在技术和程序上大有漏洞：“夫以五六名少数人之推举，固不可谓国民之公意，尤以吴氏一派长江一大势力不能加入其中，至为遗憾。”^⑫但又宣称“舍段祺瑞外，更无适任之人”。^⑬《晨报》转引路透社分析，冯玉祥对孙中山只是怀有一种“欲借孙为重”心理；段、张二氏表面上礼遇，内心实视其“无甚重轻”。^⑭该报认为段、张、孙皆为自身利益考虑，所以，三角同盟本因利益而为一时结合，也必随共同之敌

① 参见《孙中山抵沪记》，《申报》1924年11月18日，第3张第9版。

② 《长江各督为有条件的拥段》，《顺天时报》1924年11月12日，第2版。

③ 《孙文过沪几被刺》，《晨报》1924年11月19日，第2版。

④ 《各方推段与孙文行止》，《晨报》1924年11月20日，第2版。

⑤ 《孙中山昨晨离沪》，《申报》1924年11月23日，第4张第13版。

⑥ 《孙文将先赴日》，《晨报》1924年11月21日，第2版。

⑦ 《孙中山决定由沪赴日》，《顺天时报》1924年11月21日，第2版。

⑧ 《孙中山北来之行程》，《天津益世报》1924年11月30日，第1张第4版。

⑨ 《孙文北上之经过及其态度》，《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11月25日，第1张第3版。

⑩ 《孙文亦唱中日携手》，《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12月11日，第4张第12版。

⑪ 《张作霖等人通电》（1924年11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政治（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477页。

⑫ 《段氏执政应普及全国》，《顺天时报》1924年11月18日，第2版。

⑬ 《对于中国时局之东论》，《顺天时报》1924年11月22日，第3版。

⑭ 《天津会议之形形色色》，《晨报》1924年11月19日，第2版。

消失而解散。并揭内幕说：孙中山出发前曾密议四案，以备择一而行：一是以孙中山任临时总统，段祺瑞为总理；二是暂采委员制，置委员7人，孙中山任委员长，委员人选以国民党人物为主干；三是暂组摄政内阁，由段祺瑞组阁；四是召集国民大会，议定宪法，并选出正式总统。^① 此类传言，无形中加深了北方对孙中山北上意图的疑虑；这也是内心纠结的段祺瑞面对执政大位，不惜失信于人而半推半就的深层原因。故而，段祺瑞入京与孙中山绕道日本在时间上基本重合，很难说是机缘巧合。

其实早在11月10日，冯玉祥、张作霖同一天抵达天津，段、张、冯齐聚津门。至此，京津政局也由原来的曹（锟）吴（佩孚）包办变为冯、张之争。故《顺天时报》预测冯、张将发生“地盘与权力”纷争，且“以地盘分割为第一难关”。^② 冯玉祥意欲联合孙中山以反制大兵压境的张作霖；张则视冯为心腹大患，想方设法将其势力逐出京畿地区。而段祺瑞处于冯、张之间，其以“拥段”、承认其“政治领袖”地位且负统一大任为条件而支持张作霖；张则希望将段推上执政宝座，自己“挟天子以令诸侯”幕后操控政局，直系、安福系以及国民党等各派均唯其马首是瞻，孙中山仅陈述其意见而不领实权。可见，张作霖、段祺瑞主要意图在于形成以其二人为主导的新的国家权力架构。因此，冯、张始而貌合神离，终而冰炭不能相容。11日，冯玉祥致函范熙壬，赞成“根本改革，实行联省自治”。^③ 12日，冯在国民党、耶稣教会的支持下组织救国联合会，其下设立“和平统一委员会”，推段祺瑞为临时总统，孙中山为和平统一委员会会长；还容纳孙中山根本改革政治意见，协议联合拥孙中山为首领，废除总统制，实行委员制。以上诸多主张及措施，均被段祺瑞等人视为冯玉祥的政治野心乖张，尤为忌惮的是冯、孙联手，“预料孙文到京后，西南势力当随之侵入北方，而国民党及民党一派之潜势力，尤足与段张两大势力相颉颃”。^④ 13日，《顺天时报》又传出段、张、冯等人在曹家花园讨论军事问题。但14日随即澄清：冯未在受邀之列，又谓冯、张二人意见“大相背谬”，致使感情“未克十分融洽”。^⑤

张作霖与冯玉祥之间出现不睦，既因彼此猜忌，也因利益冲突。但直系齐燮元等暗中挑拨，加之《顺天时报》、《晨报》等媒体背后力量从中搅局，使得坊间谣言四起，甚至传闻冯玉祥和王承斌性命堪忧、冯玉祥已遭刺客暗杀等。王承斌为求自保，遂辞去直隶省长并交出一切兵权，在段祺瑞的会意下，奉系李景林、张宗昌取而代之，分别出任直隶省长和督理，天津由此变为奉系势力范围。《顺天时报》认为此事是双方“权势争夺之兆”。^⑥ 《大公报》则表示，张作霖与冯玉祥之间不睦纯属吴佩孚余孽挑拨捏造，实则二人甚愿互相提携，共同维持大局。^⑦ 事实并非如此。王承斌退避后，段祺瑞、张作霖就合谋将冯玉祥遣往热河任职，冯则以荐李景林镇热而解套；此计不成，段祺瑞、张作霖遂以附议冯玉祥速行解决长江问题，欲使其巡阅苏皖赣，如冯不就范，则让其前往汉口。段、张委以冯玉祥空头衔督鄂，又借“国民军”改编的机会，将其降格为第一军军长。至此，段、张“削藩”的计划大功告成，冯玉祥宣告出局，其联合孙中山拥兵自立的计划彻底破产。权力的天平遽然倾斜。这样，反直阵营内部分裂，打破了政变后京畿地区暂时形成的三头互为牵制的平衡格局，使孙中山失去了一枚制衡段祺瑞、张作霖的有

① 《孙文派之一种梦想》，《晨报》1924年11月20日，第2版。

② 《天津会议殊未可乐观》，《顺天时报》1924年11月13日，第2版。

③ 《冯玉祥赞成根本改革》，《顺天时报》1924年11月11日，第2版。

④ 《冯使组织救国联合会》，《主张根本改革之孙中山》，《顺天时报》1924年11月12日，第2版。

⑤ 《曹园会议冯使未列席》，《顺天时报》1924年11月14日，第2版。

⑥ 《权势争夺之兆》，《顺天时报》1924年11月14日，第2版。

⑦ 《冯氏态度之一斑》，《大公报》1924年11月19日，第1张第4版。

力棋子，南北竞争棋局胜负已显露端倪。

段祺瑞、张作霖联手将冯玉祥的气势打压下去后，立即着手掌控长江局势。为促成双头执政格局而扫除障碍，孤立吴佩孚、分化肢解长江直系集团，段、张合谋上演了一场政治“双簧戏”，以釜底抽薪之势收复了长江各督。张作霖以攻城为上、武力威慑在前，宣称：“余等拟暂持冷静，倘彼等诚意拥戴合肥，余亦无用兵之必要，否则为促成统一起见，亦不得不忍痛求一解决”。^① 段祺瑞则攻心为上、摇动橄榄枝倡言和平于后，以调停人之姿劝谏长江各方“勿再拥吴以免大局再归决裂”，并劝张作霖暂勿派兵南下。^② 段、张招数初见成效，孙传芳、周荫人、齐燮元、萧耀南、刘镇华、杜锡珪、蔡成勋、王普、李济臣、李炳芝等通电“拥段”。段祺瑞不仅在形式上稳住长江局势，也将张作霖、冯玉祥武力扩张化为无形，南北媾和局面初步形成，其政治声望亦随之大幅提升，成为多方博弈中最大的赢家。至19日，郑士琦、阎锡山、孙传芳、唐继尧、陈炯明、陆洪涛、高世读、周荫人、王汝勤、张锡元、米振标、马福祥、王芝祥、刘镇华、夏超等，均表拥护段祺瑞任临时执政。^③

以上南北政局新态势与孙中山北上错综牵连，是时北上不仅于策略上不宜，亦无补于时局解决，转道日本小则可避“联冯制段”之嫌，不至身陷京津各派权力斗争的旋涡；同时用实际行动向朝野及国际社会宣示其志在救国解民，绝非角逐权力，树立国民党系掌握这一关键命门的唯一政党形象。这也体现了他由外而内解决中国整体问题的新思路，绕道日本宣传其大亚洲主义的主张，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迫其和苏俄一道支持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退出奴役中国的帝国主义阵营；^④ 在此基础上，从而根本解决南北问题，最终实现国家的和平和统一。

三、进与退：寄居津门之南北争衡

11月22日，段祺瑞爽约孙中山提前入京，实为先入为主把握政治上的主动。在此期间，《顺天时报》也在为段祺瑞重掌政权加紧造势。首先，为段“即行入京”编造合法性理由，称其实有“不得已苦衷”，并以“免致中枢虚悬”与应对长江变局为辞。^⑤ 其次，登载段祺瑞入京后的首次谈话，肯定此次政变乃“继辛亥革命未竟之功，前途责任之重大，与辛亥革命（相比）有过之无不及”重大意义；段祺瑞“以退隐之身，转入纷纭之局”，作为国民一分子“不得已而出山牺牲”。^⑥ 随即，又刊发社论为段祺瑞歌功颂德：“吾人熏香净笔，谨表祝意，此盖国民之声也……芝老出山，可谓负真正之兴望也”，一是“道德品格兼全，正似暗夜之烽炬”；二是“识略抱负，俱副众望，其才干亦足以击楫破浪，脱生民于苦海”。^⑦

段祺瑞进京后，迅速抛出了事关国家机构及人事改革的“二院十三部”方案：军务院，卢永祥为院长，下设陆军部、海军部、航空部、参谋部；政务院，王揖唐为院长，下设外交部、内务部、财政部、司法部、农商部、教育部、交通部、烟酒部、税务部，并厘定各部人选名单。

① 《张作霖之最近谈话》，《京报》1924年11月16日，第3版。

② 《段祺瑞与十省联盟》，《晨报》1924年11月17日，第2版。

③ 《霖雨在望之临时执政》，《顺天时报》1924年11月20日，第2版。

④ 桑兵：《解读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真意》，《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1期。

⑤ 《段执政昨日下午抵京》，《顺天时报》1924年11月23日，第2版。

⑥ 《段氏入京后第一次谈话》，《顺天时报》1924年11月23日，第2版。

⑦ 《欢迎段芝泉入京》，《顺天时报》1924年11月23日，第2版。

11月24日上午，段祺瑞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社会各界舆论对此褒贬相差悬殊。《顺天时报》刊文庆贺：“吾人际此良辰，闻此吉讯，不胜为国家庆，又为合肥贺焉。抑（或）合肥此次出山，实出于举国一致之拥戴。盖公性淡寡欲，爱人以德，遇事常以国利民福为先，不以私人荣达为虑，是以无论南北党派，皆钦仰之而拥戴之也。”^① 旅居上海的章太炎独树一帜反段旗帜，认为段祺瑞“以地则皆非合法政府，以人则皆为民国罪魁”，所谓“其所任用者，犹是安福余孽；其所包庇者，犹是曹吴同恶”，其实不出“北洋派”之天下，无异于“君主世袭”。^② 远在杭州的康有为不仅斥冯玉祥为大盗民贼，亦指责段祺瑞纵容冯玉祥以武力劫掠清宫宝藏，谓其“反覆纵横，高下在手，狼子野心，犹尚不足，乃觊觎皇室之宝藏，明目张胆而劫之。……今公等纵之，令国民受其荼毒，为可痛也”。^③

与此同时，段祺瑞为了换取退居郑州的吴佩孚的支持，营造所谓的南北和平氛围，联合张作霖，试图迫使冯玉祥宣布下野。11月25日，张作霖入京，充当段的护法大使，对冯玉祥造成巨大压力。诚如《顺天时报》所言：“张作霖之入京也，不独驱逐宿敌吴氏，完全除去旧怨，亦且而为全国第一等之武力者。……今夫段氏已就执政之任……不得不为最有力之援助者，厥为张氏一人耳。其他虽有冯玉祥、卢永祥、孙逸仙诸氏，而能左右段氏者，则以张氏意思为最多。”^④ 值此形势，冯玉祥决意以退为进，为取信舆论先后六次递交辞呈，整日避居西山着僧衣以明志；同时借“废督裁兵”名义，加强武装准备，谋划对段祺瑞等派系实施反戈一击。因此，康有为认为冯“伪托下野，实入山中，夜夜练兵，与加拉罕谋袭京师，屠张雨帅及公（段祺瑞——引者注）”。^⑤

《顺天时报》在助段祺瑞、张作霖入京的同时，对北上途中的孙中山却不断施以舆论干扰。它声称孙中山在日稍驻，即便来京也仅以私人名义提出一种意见及计划，决不加入元老会议；个人方面仅希望当局予以一种名义借此下台，以便出洋游历。^⑥ 进而评论此举颇不足取：“中国之忧患，在内而不在于外，若果不能治内，以巩固基础，是终不能避外国之瓜分扰乱；若果能竭力于内治，则国力充实，外侮外患，自然消灭于无形。……然其口吻，既不注意于国内之祸根……且仅以此等思想为出发点，以谋国事，则敢断言其必无成功之望。”^⑦ 意指孙中山由外而内地解决国内问题的方案“走入理想”化而实难行通，有意引导中国社会视线转向国内问题而非对外废约。11月22日，孙科出面澄清，并计划当日从长崎出发，赴京帮助段、张“建设第一次真正之德谟克拉西（即民主）的政府”，同时为清除段、张等疑虑，重申国民党并无“赤化中国”主张。^⑧

随着孙中山抵达日期日益临近，京津主流社会舆论的风向在国民党动员下悄然发生转向。旅京国民党及民治主义同志会、民生周刊社、法政学报社、政治经济学会、励志笃行社、大中公学、鄂光学社等社会团体，天津各公团及旅津国民党人士大力营造欢迎气氛。天津《大公报》

① 《谨贺段执政就职》，《顺天时报》1924年11月24日，第2版。

② 《章炳麟发牢骚》，《晨报》1924年12月4日，第2版。

③ 《致段祺瑞书》（1924年11月），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1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58页。

④ 《欢迎张将军》，《顺天时报》1924年11月25日，第2版。

⑤ 《致段祺瑞电》（1924年12月13日），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1集，第363页。

⑥ 《孙中山二十二日已赴日本》，《顺天时报》1924年11月24日，第2版。

⑦ 《中山少川二先生》，《顺天时报》1924年11月29日，第2版。

⑧ 《孙科与外报记者之谈话》，《顺天时报》1924年11月25日，第3版。

称孙中山为“中国唯一有主义之大革命家，能破坏而又有方法以建设者”。^① 11月29日，天津社会各界召开筹备会，确定了“孙中山先生万岁”、“国民会议万岁”、“国民革命万岁”等欢迎口号。^②《顺天时报》配发“欢迎孙中山”时评，尊其为“建造民国元勋”。^③《天津益世报》发表社论一改往日“倒孙”论调：“夫人民之所以热烈欢迎者，非震于其名位之高，非慑于其权威之大，实为其为革命巨子也，为其为共和元勋也，为其抱有改革不良政治之宏愿也，为其具有制造平民国家之魄力也，为其有周历各国之经验，能淹贯中外之治体也。故欢迎之意，不类于官场之具文，而出于人民之心理。”^④

孙中山此次北上，对京津政治也产生了巨大影响。12月2日，张作霖在孙中山抵达前夕突然返津。其非同寻常举动，恐非表面声言筹备欢迎孙中山事宜那么简单。《顺天时报》认为，段祺瑞、张作霖“盖置孙氏于局外而欲树立时局收拾之计，结果必招孙氏一派之不满，难收举国一致之效”；张作霖逞战胜之威入京，招致了国民党及冯氏集团的恶感，坊间有传孙、冯联手策动二次政变与“驱张”计划，张选择此时出京“不可谓其非贤明之策”。^⑤ 3日，张作霖返津后，以提升迎接规格而示好孙中山，同时为塑造其礼遇民国开国元勋的开明形象，派奉系军队在塘沽至天津沿站护卫。^⑥ 可见其用心叵测！

南方派系中，对孙中山入京不乏怀疑甚至敌视者。譬如康有为，在此期间曾两度致电段祺瑞，力陈孙中山、冯玉祥不可共事，对段祺瑞与孙中山、冯玉祥之间的关系极尽挑唆之能事。其谓：“今欢迎者，乃为焚居广州之孙文，奸民所恶树之风声，以此教导国民，岂非欲以全中国为第二广州耶。如此和平，敢欺国民，颠倒奇骇，晦冥失日。是则基督教之博爱，宜钉十字架，释迦之慈悲，宜下阿鼻之狱，宜天下皆为惨祸会议也。今之居高位者，最能伪诈。夫孙文日言民权，而乃奸独裁专制；日言民权，而乃日为屠伯杀子。南孙北行，厉行俄化，言行反绳。公乃聚猘豸大风于一堂，引毒蛇猛虎为同榻，天下惊惧，善良饮泣，更为公与雨亭忧之。”^⑦ 12月13日，他在指责孙中山之余又为段祺瑞出谋划策：“吾昔与公虽有意见，今为中国舍公莫济。若公有危，国立散亡。公即避天津，合雨帅明讨贼，令长江诸联盟以为捍障。吴子玉才武忠义，宜起为练兵总监，为公保卫，调和张、吴，同心讨贼，以救中国，泣血陈辞，代转雨帅。”^⑧《晨报》甚至一度放出风声，说康有为将亲自北上发难。^⑨

在北京亦是如此。12月4日上午驻京英、美、日、法、意等国公使团，紧急会商应对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政府之赤化”问题之对策。《顺天时报》明为欢迎，暗含贬斥，告诫受众“宜以一理想家而欢迎之，并宜使其以一理想家而膺指导国民之重任也。若欲以为实行家而使之

① 《天津市民筹备欢迎孙中山先生》，《大公报》1924年11月24日，第2张第6版。

② 《欢迎中山筹备会开会记》，《天津益世报》1924年12月1日，第3张第10版。

③ 《欢迎孙中山》，《顺天时报》1924年12月4日，第3版。

④ 《为孙中山进一言》，《天津益世报》1924年12月5日，第1张第2版。

⑤ 《张雨亭之出京》，《顺天时报》1924年12月4日，第2版。

⑥ 《本埠特讯》，《天津益世报》1924年12月4日，第13张第3版。

⑦ 《康南海之与段合肥论政》，《天津益世报》1924年12月4日，第2张第7版。此电乃康有为1924年11月《致段祺瑞书》（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1集，第358—359页）之修改稿：其一，前者抬头为“北京段芝泉先生鉴”，后者为“天津段督办芝泉先生鉴”，可知此电系在前电基础上修改并于段入京后发出；其二，内容改动和增幅较大，如新增了斥孙内容，措辞用语较前更为犀利狠辣，前电固为清室鸣不平，实在挑动段张与冯关系，后电则重在离间段张与孙冯关系。

⑧ 《致段祺瑞电》（1924年12月13日），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1集，第363页。

⑨ 《康有为即北上》，《晨报》1924年12月8日，第3版。

当行政之局，实误谬之甚者也”，同时正告孙中山不宜将其政治理想与“俄国共产主义者取一致之行动，或倚俄国共产政府之后援”。^①《晨报》凸显孙中山对日本“大表好感”，暗指其有“媚日”嫌疑，并借渲染“大亚细亚主义”，称“亚细亚民族，不可不排除不道理之欧美人势力，盖是项势力一经排除，则中国问题自然解决”，明治日本“由锁国解放吸收欧美之文化结果，反陷于欧美祸”，日本“目下无见好英美人之必要”，而应以“速归于亚细亚主义，而尤以承认俄国为其第一步”；从而挑起欧美人“仇孙恶俄”的心理。^②

12月5日，《晨报》称孙中山因疲劳过度得胃肠病，须行静养，定于8日入京。^③此消息一出，再次引起南北舆论哗然。《香港华字日报》认为孙中山是受外界环境刺激的“真病”，“京津人士皆以孙文主张共产，发生疑虑，而外人既制止学生欢迎，复暗阻孙氏入京。孙文此行，已呈不利景象。孙之病其或以此乎，其或以此而发生猛烈之激刺，乃不得不病乎”。^④复又揭秘：孙氏因宣传“过激主义”而引起外交团抗议，修改不平等条约因此而搁置，故段祺瑞从中作梗不欲孙中山入京，并以不宣传共产为交换条件，以履行此前双方达成的孙中山任大总统出洋游历、段祺瑞任副总统摄行大总统职。^⑤而《顺天时报》转引了中美社分析，认为是“托病”，原因有二：一是对于时局情形尚未明了；二是国民党“内讧”所致，汪精卫、卢师谛随侍孙中山参与枢机，卢师谛素以稳健派自居，汪精卫受共产派包围并与鲍罗廷、谭平山共同策划牵制孙中山的北上政略；京沪国民党的纯粹分子试图联合卢师谛，遏制共产派行径，两派之争当是牵制因素。^⑥天津《大公报》亦持此论。是时，“赤化”问题也在北方各政派及北方舆论中持续发酵，连国外亦盛传广州将宣布为苏维埃共和国。出于消除各方疑虑，孙中山亲自致函张作霖表明“中俄邦交之亲睦，余固虽切实希望，然对于共产主义，则绝对不能赞成”；^⑦并委托汪精卫出面辟谣，重申“不实行共产主义”。汪精卫转述说，亲俄为一事，共产又为一事，不能以其亲俄，即目为共产。^⑧

政治人物讳疾忌医本为常态心理，孙中山再三托病，病体应是自身难以克服的阻力之一。12月13日，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描述道：“予察其容颜，髭毛之色，颓然衰老，远不如昔年所见之壮盛时矣”。^⑨5天后，许世英电称孙中山病已愈，定22日来京；但随后又传出改为23日上午11时，且称孙对“中国之将来”既不抱悲观亦不乐观。^⑩而《香港华字日报》仍坚持内外阻挠说，称孙中山再留津一星期，如无入京机会，即行返沪；^⑪甚至传出孙中山已决定中止入京。^⑫种种说辞扑朔迷离，真假难辨。

① 《孙中山入京及其欢迎之理由》，《顺天时报》1924年12月7日，第2版。

② 《孙文之谈话》，《晨报》1924年12月6日，第3版。

③ 《孙文缓期来京》，《晨报》1924年12月6日，第2版。

④ 碧藏：《异哉，孙文之病》，《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12月9日，第1张第2版。

⑤ 《孙文到津情形及今后竞争总统之计划》，《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12月11日，第1张第3版。

⑥ 《孙中山延期来京原因》，《顺天时报》1924年12月8日，第2版。

⑦ 《孙中山反对共产主义》，《顺天时报》1924年12月13日，第2版。

⑧ 《孙中山与共产主义》，《顺天时报》1924年12月18日，第2版。

⑨ 《津日颌目中之孙文》，《京报》1924年12月14日，第3版。

⑩ 《孙文改期来京》，《晨报》1924年12月21日，第2版。

⑪ 《本报特电》，《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12月19日，第1张第2版。

⑫ 《本报特电》，《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12月24日，第1张第2版。

应该说,孙中山此次托病,与段祺瑞推行的所谓“革命行为”也大有关联。12月14日,段祺瑞打着“革曹锟之命”旗号连颁三令:一是1923年10月曹锟颁布之宪法无效;二是1912年所颁《临时约法》失效;三是取消陷于“自然消灭状态”之国会参众两院。《顺天时报》称段祺瑞欲推行“迭克推多政制”(Dictator,独裁者),以建立“无限制专制政制之政府”。^①孙中山对段祺瑞颠覆法统举动大感惊骇,孙科代父陈词:“苟段氏以其地位为合法,不得人民同意,而将国会与约法取消,则将来如再有军阀,起而另组新政府,亦可任意将现在之政府取消,自造制度,且亦认为合法之举矣,故吾人断不可忽视。盖此种举动,将造成未来之纠纷,苟人皆起而效尤,焉有止境。”^②段祺瑞无视法律上程序正义原则,在政治上是对现代民主价值和制度的根本挑战,孙中山难以接受,因而托病有意迫段让步。《晨报》由此认为孙中山、段祺瑞貌合神离,唯表面上“极力敷衍”。^③《香港华字日报》则打着“主权在民”的幌子,表面上秉持正义,实则暗中挑拨孙、段二人之间的关系,声称“尤恐恶例一开,今后战胜者皆得藉武力以蹂躏国家之根本大法”。^④《顺天时报》亦谓:“盖中山方面与北京方面之关系,极为不良,是以中山暂行留津,以静观江西与长江方面之变化,再定行止。”^⑤

四、死而后已:最后履京的遗恨

12月31日,孙中山忽然扶病入京,震动京师内外。是日下午3时,各团体代表在中央公园水榭召开欢迎筹备会,准备动用两架飞机空投传单10万份;“青天白日”小红旗20万面;各种欢迎传单147种共计256万张,到车站欢迎人群计有10万人之众。^⑥这种盛况空前的迎接场面,既是国民党多方运动的结果,亦反映了京师基层社会冀望孙中山扭转国家乱局的热切心理。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南北报纸舆论仍不断制造并传布“非孙”言论。《晨报》发表感想:“回溯民国元年孙入都之日,不觉瞬逾十稔,此过去岁月中人事之变迁者何限,即孙自身前后亦颇有歧异之处……然以标榜所谓三民主义之党魁,比年以来对于与此主义绝不相容之军阀,居然有互相利用、互相勾结之事实,甚且其自身亦成为军阀化,以较元年以革命首功资格入都之时,其变化之甚乃如此,此则深足惋惜者也”。^⑦认为孙中山晋京是为分享反直同盟胜利功劳,希望以徐谦、李烈钧、吕公望为鲁、赣、浙三省省长,与段祺瑞、张作霖朋分地盘。^⑧此前《香港华字日报》也发表了类似报道,称孙中山志在总统之位,北上意在联合冯玉祥举事,“目光决非在段也,冯玉祥之避居西山……而孙又恰有养病西山之说,司马之心,路人皆见矣。”^⑨

① 《执政府表示革命行为》,《顺天时报》1924年12月15日,第2版。

② 《孙科之谈话》,《晨报》1924年12月20日,第3版。

③ 《孙文何为不来》,《晨报》1924年12月23日,第2版。

④ 惠风:《善后会议与取消约法问题》,《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12月22日,第1张第2版。

⑤ 《孙中山有中止入都之势》,《顺天时报》1924年12月25日,第3版。

⑥ 《孙文今日午间来京》,《晨报》1924年12月31日,第2版。

⑦ 德音:《告孙文》,《晨报》1924年12月31日,第2版。

⑧ 《欲以朋分地盘谋统一》,《晨报》1924年12月31日,第2版。

⑨ 碧藏:《孙文入京矣》,《香港华字日报》1925年1月3日,第1张第2版。

此两报还不时爆出国民党内斗猛料，借以抹黑孙中山及国民党的形象。譬如，传居京国民党组织“各省区旅京国民党护党同志办事处”，天津发生汪精卫被殴事件；又传“海内外同志卫党同盟会”成立，该团体要求剥夺汪精卫包办国民党党务大权，并向孙中山上书历数共产派罪行：（1）反对义师北伐；（2）离间友军好感；（3）密充军阀鹰犬；（4）攻击总理北上；（5）火烧广州商场；（6）侵吞工会捐款。并要求一律撤换国民党中央执委及各执行部共产党籍职员，本党一切大小事权不许外国人干预。^①《晨报》还针对“海内外同志卫党同盟会”历数共产派几条所谓的罪行逐一进行了分析：关于第一、二条，“国民党一向行为，是凭恃武力，是勾结军阀”，共产派反对理由充足；第三条，共产派、国民党都“免不了做军阀鹰犬”；第四条，其言“若是表面宣传三民主义，而里面还是和军阀勾结，争督军省长，那末共产派反对他来，是有道理的，我们也就只能以政客的军阀视他的”；第五条，“国民党员尽谗为共产派所为，怕说不（过）去”；第六条，共产派如有此类情况则为“共产主义之羞”，并以反讽口气评论若国民党亦“有此丑行，那更是罪大恶极”。^②该报还对孙中山所主张的“中日提携”和“王道的大亚细亚主义”进行了批评，认为其居心叵测，“国民党既然揭橥反帝国主义，既然认为欧美各国都是帝国主义的巢窟，没有合作的余地，何以对于民主主义远逊欧美的日本，欧战后反动加甚，天天想慕意大利、西班牙的日本，帝国主义比较各有加无减的日本，认为可以提携”；甚至指责“主张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到了日本，竟和一般帝国主义色彩最浓厚的‘浪人派’去谋亲善；更可怪的，是大亚细亚主义，本是前十八年前我们游学日本即已听见过的长阀（陆军阀）、萨阀（海军阀）和桐花会（保皇党）人们的主张，今日浪人派持之特甚”。^③

孙中山入京后，国民会议与善后会议之争上升为南北政治角力的主轴，亦是南北各大报纸关注的焦点。段祺瑞入京前发表通电明确表示依次召集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④然而，段祺瑞主导拟定排斥各人民团体之《善后会议条例》，与孙中山《北上宣言》勾画大相径庭，故孙声言“其基础非由人民之地位以为决定，则与往年之督军团会议又奚择”。^⑤《大公报》在孙中山赴京前发表署名文章，指出“善后会议为国民会议必经之途径……第先开善后会议，则善后会议一日不能终局，即国民会议一日不能产生”，^⑥此论是否有意为段派政见张目尚待确证。

不过，孙中山在入京前夕早已加紧布置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国民会议促成会，自南至北开展国民会议运动；其一入京，北京各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于1925年1月3日成立。11日，经其授意对外宣布此次入京目的：对内催促国民会议早日召集；对外则废除不平等条约。^⑦就此，全国出现了关于集权与分权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与取向，相应形成了两个对立争锋的系统，既关系孙、段以及南北关系走向，亦牵扯国家统一与分治之间的协调。

① 《国民党中反共产派决推倒共产派》，《晨报》1925年1月14日，第3版。

② 勉：《国民党与共产派》（上），《晨报》1925年1月14日，第2版。

③ 勉：《国民党与共产派》（中），《晨报》1925年1月15日，第2版。

④ 《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并发表国是主张通电》（1924年11月2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政治（二）》，第1478页。

⑤ 《国民党与国民会议》，《晨报》1924年12月25日，第3版。

⑥ 丹荣：《欢送孙中山先生赠言》，《大公报》1924年12月31日，第1张第3版。

⑦ 《孙中山到京目的》，《北京日报》1925年1月12日，第2版。

客观而言,孙中山本人起初对善后会议“从未与闻”态度,表明其不予认可;此后则变为可做适度调和,并非全然反对。1月17日,他发表《为反对包办善后会议事致段祺瑞电》,表明国民党所争并非名义,如能在构成分子之上吸收实业团体、教育会、学生联合会以及农工商会代表,自无反对理由。段派为控制社会舆论走向并借此离间国民党内关系,断章取义对外宣称孙中山并不反对善后会议。事实上,国民党内根本反对并拒绝加入者不在少数,宣称孙中山此来“唯在促成国民会议”;^① 吴稚晖认为,善后会议实质是对国民会议之“包办”,与国民党“解决根本纠纷,一个最后的希望”的期许大相悖逆。^② 另有主张与其消极反对,毋宁加入以为牵制段派。^③ 内部分歧毕竟易于协调,问题的关键则在于孙中山、段祺瑞二人立场能否妥协并达成一致。18日,善后会议筹备处以《善后会议条例》早经公布且有代表来京为由,拒绝了孙中山的意见。^④ 段祺瑞的强硬回拒,对孙中山病情的加剧无疑是一个不小的刺激。^⑤ 孙中山随即联合天津、张家口、保定等地国民会议促成会,予以回击。

段祺瑞抗拒国民党主导召开国民会议,固然与其疑惧对方有“赤化”嫌疑相关,但实质是维系其个人集权惯性思维作祟,故其表面赞成实则反对,并设法阻挠或破坏。1月22日晚,许世英在答复记者时表示,对孙中山建议“大多数主张为相当之容纳”,但对详情秘而不宣。实际方案是:聘请各团体代表为专门委员,包括各省议会议长、各省教育会会长、各省城总商会会长、各省农会会长各1人,京、津、沪、汉总商会会长各1人。此案一出,立即遭致南北各方及舆论抨击。《晨报》批评其参会分子几全为“软派”的,而且武人几占3/4以上,不能不让人产生“绝望的”和“反对的”态度。^⑥ 胡汉民等人谓“反对善后会议主张,系革命政府之唯一政策”。^⑦ 汪精卫也表示,孙中山的让步“已可谓到极点了”,然而临时执政“只罗致一些未完全的职业团体代表来做什么专门委员,且有发言权,无表决权,和上海工部局的华人顾问一样。主权在民的意味消失无余。大元帅北行……至此便又受了一大挫折了”。^⑧

孙中山面对段祺瑞的虚与委蛇与操弄权术,内心感到无比的失望而愤懑,但已处风烛残年,他也是有心抗争却无力回天。1月31日,当汪精卫等至病榻前报告段派复电时,他只说了“任凭他”三字。^⑨ 下午1时,在汪精卫、吴稚晖主导下,在京国民党党员360余人决定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建议,凡是来京党员代表一致不准加入善后会议,以为抵制。^⑩ 但由于内部派系分化加重,汪、吴的权威未能有效约束党员个体行动,与其政见不同者纷纷出席,这对孙中山的病情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壮志未酬的孙中山在内外交困中溘然长逝,意味着他此次北上之行的终结,其所向往的国家和平统一新政治构想亦未能实现,这成为他最后履京最大的遗憾。

① 《孙中山今日抵京》,《北京日报》1924年12月31日,第2版。

② 《国民党不加入善后会议》(1924年11月),《吴稚晖全集》卷6,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552页。

③ 《善后会议与孙文》,《晨报》1925年1月19日,第2版。

④ 《昨日执政府之特别会议》,《晨报》1925年1月22日,第2版。

⑤ 有认为孙中山病情加重并病逝于京,与其“劳累过度,刺激过深,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有关。参见《包惠僧回忆录》,第168页。

⑥ 渊泉:《善后会议开了》,《晨报》1925年2月1日,第2版。

⑦ 《段祺瑞善于对付孙文》,《晨报》1925年1月31日,第2版。

⑧ 《孙大元帅北上入京之经过》,《汪精卫全集》第3册,上海:三民公司,1929年,第33—34页。

⑨ 《孙中山之病状》,《北京日报》1925年2月2日,第2版。

⑩ 《国民党昨日开会》,《晨报》1925年2月1日,第2版。

尝谓臧否人物盖棺而论定。孙中山的死则不然，全国各新闻报纸仍余波回荡，久久不绝，并且呈现南北正反两极化叙述。南方上海《民国日报》、《广州民国日报》等国民党系报纸努力建构“革命元勋”光辉形象；北方以《晨报》为代表，凭吊之余评估其一生功过，谓其为提倡“种族革命之急先锋”，为反袁行“彻底之革命”；后则“倾向武力，迷信武力”与“利用武力”，直至“军阀化”；以“共产主义”为利用手段亦与此等同，但迫于外力压迫与军阀心理，遂不惜以本党名义宣言反对，“不意所谓主义者，乃竟随时随地而可以任意变更如此”。^①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关于对孙中山北上及其逝世后报道和评论的舆论乱象，不仅折射出清季民初全国各大报纸舆论的并立争锋与多元格局，也是南北分治、华洋两隔独特政治、社会和文化现象的反照。也正是在这种国内外局势发生大转折之际，孙中山试图打通南北内外政治：对内打倒军阀，以国民会议为中心构建新政治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和平与统一的整体问题；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以拔除内乱根源，近则实现中国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梦，终极目标则指向亚洲和平、天下为公的大同至境，体现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在其身上融为一炉的思想特质。然而，政治上的不统一，必定造成新闻与舆论的分裂。在这一时期，正是由于国家权力的缺位而造成对新闻管控的缺失，一度标榜为新闻独立、代表社会良心发声的一些报纸媒体，不幸充当了不同政治派别的代言人或成为彼此角力的工具，甚至助纣为虐。孙中山的本意经南北各政治派别及报纸舆论重构后，却变成了任意涂抹解读的光怪陆离的叙述，远远偏离了其思想内核和精神主旨，甚至被误解与曲解。连锁效应，新闻舆论的不实报道，客观上对南北政争起了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必然加剧了政治与社会内部裂痕，它所产生的张力对孙中山的北上本意也起了不小的消解作用，使其深陷政争和舆论纷争旋涡，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

〔作者杨瑞，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石家庄 050024〕

（责任编辑：耿显家）

^① 《悼孙文氏》，《晨报》1925年3月13日，第2版。

large sums on it but also appointing a Yellow River governor, setting up a specific office, and establishing institutions, exhibiting an unprecedented intensity of intervention. Previous research has tended to believe that the main reason for this was that since the Qing had taken over the Ming system, it saw Yellow River conservancy as a measure for supporting water transport. However, the facts show that a lot more was involved. It is undeniable that if, at times when river transport was a priority, the political center was in the north and the economic center was in the south, the protection of water transport was a major mission for river conservancy, let alone the frequent flooding of the Yellow River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Qing dynasty.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under the unstable and complicated situation, the Qing emperor also included the governance of the river into the strategic project of constructing the legitimacy of the regime. The activities of disaster relief, protection of the people's livelihood, worship at the tomb of Yu the Great, continuing the previous ruling traditions, bestowing on honors on river gods, and exploring the Yellow River's source were all based on this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In the mid-Qing period, despite multiple serious problems including difficulties in the Yellow River control and selection of officials, the Qing emperors still actively explored "managing the River" (*shi he*). Other considerations besides "protecting water transport", were the inertia of tradition and observation of the ancestral family rules. As one of the most ambitious Qing projects, the governance of the Yellow River was not only a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but also a national political project of great importance, highlighting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Late Qing Sino-Foreign Treaty Relationships and Tributary Relationships Li Yumin(53)

In the late Qing, Sino-foreign treaty and tributary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reflected international orders that were different in kind. The tributary relationship had shaped the idea of "common rule of all under heaven" (*tianxia gongzhu*) centered on China, but in a sense it was an illusory construct whose name did not reflect reality, whereas the treaty relationship, based on the idea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the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was a modified and unbalanced international norm. The former aimed at establishing a self-defense framework that used tributary relationships to "make the barbarians form a defensive wall" (*shouzai siyi*); the latter was keen to secure actual rights and interests, especially economic interests. The inequality of the former was mainly reflected in forms of intercourse that absorbed Sino-foreign relations into the ritual of the sole authority, the Celestial Empire (*tianchao*); the latter exercised "quasi-rule" over China, which in actuality meant undermining its sovereignty. The former practiced the morality of the kingly way, of "non-rule" and "recognizing the weak"; the latter exhibited to the full the hegemonic way of "military force" and "oppressing the weak". The connot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different type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have their own complex elements and factors.

The "Historical Facts" and "Narratives" of Sun Yat-sen's 1924 Journey to the North: Public Opinion in the Mainstream Press Yang Rui(71)

Sun Yat-sen's 1924 trip to the north was important for the reorganization of national political arrangements and for the rebuilding of Sun's own political image. If we go back to that historical era, we find that the facts themselves and the original intentions of Sun's journey to North China, while parti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observa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southern and northern political factions and with public opinion as reflected in the press, were mostly characterized by distortion and misdirection. Once they had been reshaped by different political factions and newspaper opinion, "historical facts" that should have been unambiguously defined became puzzling "narratives" that confounded the true and the false. Sifting through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sources and, as much as possible, making this event the fulcrum for ordering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occurrences enables us to actively seek the logic behind the conversion of “historical facts” into “narratives” and to trace back “narratives” so as to restore “historical facts.” The quest for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an stand as an effective key to reading Sun Yat-sen’s original intentions and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tical interaction and evolution of North and South. This paper reveals the intricate interlocking factual connections that different political factions reconstructed around the new political system, together with their internal and external influences.

The Dispute between Japanese Colonial Cliques over Policies for the Currency Standard in Northeast China (1906-1933)

Yan Hongzhong and Xu Chen(88)

Japan’s prewar colonial penetration and economic aggression in northeast China was accompanied by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truggles and rivalry. From the time when the Japanese colonial forces entered the Northeast, currency policy was torn between adoption of the gold or the silver standard. The perennial disputes and confrontation among Japanese cliques on this issue meant tha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esitated over the Northeast currency policy for a long time. After the Russo-Japanese War, Japan had initially planned to use the Yokohama Specie Bank’s silver-backed notes to gain a dominant position in Northeast currency, but this was resisted by the Kanto Government and the Manchurian Railway Company. Japan’s strategy then changed to promoting the gold standard through the Bank of Korea’s gold-backed note issue, which it tried to impose on the Dalian Exchange, but this policy also failed. When, around the tim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uppet Manchukuo regime, the dispute on the currency standard was revived, the silver standard retained the upper hand. The paper currency of the puppet Manchukuo Central Bank was still silver-based and unredeemable. It was only after the signing of the Japan-Manchukuo Exchange Equivalence Agreement that the bank’s note issue formally abandoned the silver standard and was incorporated into the yen monetary system. 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total war of Japanese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a series of puppet government-issued “Lianyin notes,” “Mengjiang notes” and “Central Reserve Bank notes” came out in rapid succession, in yet another instance of the Japanese yen’s riding roughshod over China’s financial system.

On the Origin of Changes in the Wilson Administration’s China Policy

Ma Jianbiao(106)

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the powers renewed their alliance in the form of a six-power banking consortium and tied the issue of diplomatic recognition of the Republican government to acceptance of loan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eizing the opportunity to expand their interests. Squeezed out by the British and Japanese, the United States lost its say in the powers’ “dollar diplomacy” with China.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parked the enthusiasm of American Christians for the Christianization of China. American missionaries to China and U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ircles worked up public opinion, denouncing the Taft administration’s complicity with the great powers and its opportunistic profiting from Chinese disarray as “un-American” and urging the US government to recognize the Republic of China as early as possible, in attacks used by the Democratic Party to win the next general election. Wilson had close ties with religious circles. As president, he abandoned America’s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alliance with the great powers on the issue of recognition and withdrew from the bank consortium, launching unilateral diplomacy. Republican diplomats acted as go-betweens in rallying the faithful. When the Wilson administration’s China policy encountered obstacles, a “prayer strategy” was launched that called for Christians to pray for the Republic of China, providing them with further inspiration and encouraging the government to recognize the Republic. The Wilson administration once again gained the diplomatic initiative in China, opening up a new pattern in the prewar special relationship of the two countries.